

依附型金融化与中东欧国家的 去金融化改革*

刘 慧 李文见

[内容提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金融化进程使中东欧国家陷入依附型金融化困境。由于国内转型战略与加入欧盟的相互影响,中东欧国家形成了维谢格拉德国家的依附型出口拉动模式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依附型贷款拉动模式。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东欧国家试图通过去金融化和金融抑制改变其依附型金融地位。不同国家的去金融化程度有所差异,以匈牙利为代表的维谢格拉德国家偏重部门税和公司国有化,以拉脱维亚为代表的波罗的海国家坚持紧缩和内部贬值策略。总体上,这些国家只是改变了一些经济机构,而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潜在的增长模式。长期来看,去金融化可能会减少中东欧国家生产性行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金融民族主义既难以同全球金融资本相对抗,也无法摆脱其自身的依附地位。

[关键词] 依附型金融化 中东欧国家 去金融化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1.03.015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资本主义金融化逐渐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普遍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到 90 年代末,伴随着银行体系的金融化,中东欧国家的生产和出口部门被跨国公司控制,外资银行在该地区所占的比例也相对较高。面对外资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的压力,中东欧国家陷入依附型金融化困境。依附型金融化导致了中东欧国家的脆弱性,它并没有给民众带来预期中的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反而产生了贫富分化、外国资本控制、腐败等问题。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

后,匈牙利、拉脱维亚等国家试图通过去金融化改变其依附型金融地位。

一、依附型金融化及其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金融全球化和激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被英美等国当作一种“普照的光”加以推广,其他一切都不得不上它

* 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福利资本主义变革背景下的美欧气候政策走向及中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BGJ080)的阶段性成果。

的色彩。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迅速增加,背后都藏着美帝国主义的利爪。”^①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满足国际资本的要求,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化进程一开始便与国际货币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交织在一起,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手段。^②丹妮拉·维罗妮卡·加博(Daniela Veronica Gabor)在追踪中东欧国家银行体系金融化进程时,强调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为这些国家提供贷款时要求取消一些审慎的政策工具,而这些工具本来可能会对该地区在2008年之前由于资本流入激增而开启的金融化进程有所限制。^③

由于高度依赖外国资本,中东欧的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依附型资本主义。这些国家都已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原有的欧盟成员国。因此,促进短期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竞争力仍然是依附型市场经济国家的重中之重。^④以国际货币等级制为基础,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这些国家似乎已经陷入了依附型金融化的困境:一方面,依赖外部资源以获得金融发展和国际信誉;另一方面,对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又使其极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⑤依附型金融化发展与其内外推动因素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尽管越来越多地以本币计价,但其资本流入仍然极不稳定,并越来越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立场及全球风险认知的影响。这与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中越来越多的外国银行及其他境外非银行业类投资者密切相关。国外投资者在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中所占份额日益增高,意味着其国内总部的资金状况发生任何变化,或者风险认知的收紧都将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内资产及汇率、储备库存产生直接影响。^⑥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依附型金融化的投资期更短、利率更高,短期投机行为的风险敞口更大,来自外部的风险性更高。外资银行的主导地位能够引领和塑造不平等的监管和制度环境,推动由关系型借贷向市场化借贷的转变,进行外币的“疯狂放贷”,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些国家的本币进行投机冲击。^⑦

其次,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中东欧转型国家大多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对外来资本需求的不断增加及国际资本的源源流入,导致了真实汇率的升值^⑧,致使本国制造业的价格优势明显下降,进而导致了生产部门的结构变化。去工业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陌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制造业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民收入尚未达到较高水平时其制造业便开始收缩,^⑨则被称为“提前去工业化”或“金融荷兰病”,中东欧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相对于美元的主导地位,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较低的地位,这迫使其承担更高的利率。高利率再加上国际市场宽松的放贷条件和较低的风险认知,使得主要的非金融公司选择通过以美元计价的证券向国外借贷并从事投机套利交易活动。^⑩

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② José Luis Oreiro and Carmem Aparecida Feijó (eds.), “Peripheral Financialization and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A Theory and the Case of Brazil (2003–2005)”, in *Preliminary Draft*, August 2020.

③ Daniela Veronica Gabor, “The Road to Financial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Early Policies and Politics of Stabilizing Transition”, i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4, No. 2, 2012, pp. 227–249.

④ Stefan Četković and Aron Buzogány,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When Renewable Energy Hits Different Economic Logics”, in *Climate Policy*, Iss. 5, Vol. 16, 2016, pp. 642–657.

⑤ Cornel Ban and Dorothee Bohle, “De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Policy Continu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 pp. 1–23.

⑥ Pablo G. Bortz and Annina Kaltenbrunner,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Financ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9, No. 2, 2017, pp. 375–393.

⑦ Cornel Ban and Dorothee Bohle, “De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Policy Continu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 pp. 1–23.

⑧ 高鸣震《论中东欧国家转轨十年中汇率制度的选择》,载于《世界经济情况》2006年第8期。

⑨ Dani Rodrik,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i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 No. 1, 2016, pp. 2–3.

⑩ Pablo G. Bortz and Annina Kaltenbrunner,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Financ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9, No. 2, 2017, pp. 375–393.

非金融公司影响力的上升、资金持有量以及所吸引投资量的扩大,都会分散对生产性部门的投资。向国外借贷的非金融公司占据了国内生产部门投资相当大份额,外部金融状况的任何不利变化都可以通过影响大型非金融公司的投资决策来将风险转移到这些国家内部。^①

最后,依附型金融化的发展不仅对生产部门造成了巨大影响,还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其一,国民经济部门的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工资份额的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取代意味着劳工收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②其二,依附型金融化意味着这些国家易受到短期投机行为的影响,面临着过度的外部脆弱性,^③而危机带来的成本则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此外,在依附型发展模式,政府的政策空间严重受限,迫于诸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它们通常会实行紧缩政策及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的去管制化,这削弱了劳工联盟的议价能力,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二、中东欧国家的依附型金融化及增长模式

20世纪90年代,当西方公司从低工资地区寻找投资机会时,外国直接投资便开始流入这些地区。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与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存在着内在联系。到90年代中期,除斯洛伐克外,其他申请入盟的国家均设立了国家投资促进机构,这些机构代表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尽管欧盟没有特定的法律工具促进中东欧外国直接投资,但可以依赖其设定的成员国接收条件来促进外国资本流入。在欧盟的加入条件及年度报告中,更是特别建议入盟申请国通过外资持股在若干战略部门实现私有化,并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明确为加入欧盟的一个重要条件。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从21世纪初开始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④ 欧盟同时还资助国家投资促进机构,这些机构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的外资银行占有率达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最高水平。外资企业更多地依靠其母公司或者国外金融机构的借款,而不是国内的金融体系。外资银行充当了跨境信贷的中介,国内金融系统的盈利活

动则涉及一些短期计划(其资金来源于跨境信贷)以及日益金融化的货币市场和银行间货币市场的新型关系。^⑥

自2000年开始,澳大利亚、意大利和瑞典的银行开始进入中东欧地区。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外资银行的资产份额在匈牙利超过82%,在拉脱维亚超过60%。^⑦ 2000年之后,罗马尼亚的经济通过越来越多样化的金融行为体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加入欧盟的计划加速了该国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取消了对于非本地行为体固定收益交易以及股票市场的限制,这个过程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最终完成,相较于其加入欧盟提前了一年。巨额的资本流入引入了新的盈利模式,这一模式依赖于对短期收益的追求以及汇率升值或稳定,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依附型金融化带来了显著的脆弱性和监管挑战。外资银行和外资公司主要依赖其集团内部的融资,可以绕过东

① Pablo G. Bortz and Annina Kaltenbrunner,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Financ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9, No. 2, 2017, pp. 375 - 393.

② Eckhard Hein, *The Macroeconomics of Finance - dominated Capitalism - and Its Crisi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p. 33.

③ Pablo G. Bortz and Annina Kaltenbrunner,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Financ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9, No. 2, 2017, pp. 382 - 383.

④ Dorothee Bohle, "European Integration,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Crises Trajectories on Europe's Eastern Periphery",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2, 2018, pp. 239 - 253.

⑤ Dorothee Bohle & Béla Greskovits, "Politicising Embedded Neoliberal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Hungary's Development Model",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42, No. 5, 2019, pp. 1069 - 1093.

⑥ Daniela Gabor, "The Romanian Financial System: From Central Bank - led to Dependent Financialization", in *Financialization, Economy,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ESSUD) Studies in Financial Systems*, No. 5, 2013, p. 27.

⑦ Dorothee Bohle, "Mortgaging Europe's Periphery",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53, No. 2, 2018, pp. 196 - 217.

⑧ Daniela Gabor, "The Romanian Financial System: From Central Bank - led to Dependent Financialization", in *Financialization, Economy,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ESSUD) Studies in Financial Systems*, No. 5, 2013, p. 26.

道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措施,后者对信贷周期只能施加有限的控制。此外,遏制外币信贷的举措受制于欧盟范围内的竞争环境,和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争议的监管责任以及外资银行内部资本市场的监管套利。而且,跨国银行可以通过向其母公司转让贷款以抵制监管措施。^①

基于国内转型战略与加入欧盟的相互影响,中东欧国家依附型模式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一种是维谢格拉德国家的依附型出口拉动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以务实的方式追求新自由主义的转型策略,通过提供免税期、简化税法、放宽劳动法、特定的投资计划,有时甚至削减社会开支以吸引投资。当然,这种代价过高的政策是由投资者所推动的,尤其是北欧的跨国公司企图利用其相对廉价且熟练的劳动力、灵活的劳动法和慷慨的投资激励,将部分生产转移至东欧国家。每一项新投资都会通过“选美式”的竞争,落入提供最优惠条件的国家。德国、荷兰及奥地利的资本涌入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使得维谢格拉德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奇迹。^②另一种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依附型贷款拉动模式。^③波罗的海国家采取了激进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战略,去工业化更加彻底。改革派精英一致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是对其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大威胁。他们的改革战略旨在同过去彻底决裂,回应民众对独立国家地位的需求,并达到塑造国家认同的目的。他们认为其所继承的工业遗产是前苏联遗产的一部分,快速的去工业化在他们看来更为可取。因此,外资主要投资于该地区的银行业和房地产业。波罗的海国家银行业投资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在某些方面也与欧元区南方国家的债务拉动型模式相似。家庭债务迅速增加的同时,工资上涨,推动了通货膨胀,出口竞争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达到两位数,甚至比欧洲南部国家更为脆弱。^④

本文选取匈牙利和拉脱维亚作为上述两类国家的代表进行分析。两国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都可以被视为外国直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典型。2016—

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占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欧盟平均水平的3.6倍,而拉脱维亚的这一比例也达到欧盟的3.5倍之多。^⑤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及房地产业在两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较制造业均更胜一筹,但这一趋势在拉脱维亚更为显著,且危机过后的拉脱维亚仍然保持了这一状况;但在匈牙利,制造业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去金融化与金融民族主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国际资本流入结构改变,国际证券投资流入总量提升,外国直接投资下滑,银行贷款波动剧烈。中东欧国家的出口减少,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国内外债总额高速增长,银行部门中外资银行占比过高,对外风险敞口增大。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经济的脆弱性,还导致了对外商投资依赖性的不满持续升温。去金融化及金融抑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去金融化被定义为一种旨在延长投资周期、调低利率、减少外汇借贷,以及降低国内债券市场外部脆弱性的政策尝试。金融抑制旨在使金融从属于国家优先事项,试图使金融从属于国家发展目标,因此被看做是金融民族主义的形式之一。^⑥

(一) 依附型出口增长、部门税与国有化

2009年后,欧美金融市场继续恶化,西欧资金大量抽逃,导致匈牙利福林贬值,偿债压力增

① Daniela Gabor, “The Romanian Financial System: From Central Bank – led to Dependent Financialization”, in *Financialization, Economy,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ESSUD) Studies in Financial Systems*, No. 5, 2013, p. 26.

② 张广婷《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性研究——基于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页。

③ Dorothee Bohle, “European Integration,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Crises Trajectories on Europe’s Eastern Periphery”,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2, 2018, pp. 239 – 253.

④ Dorothee Bohle, “European Integration,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Crises Trajectories on Europe’s Eastern Periphery”,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2, 2018, pp. 239 – 253.

⑤ OECD Data, “FDI Flows (Inward, % of GDP, 2020 or Latest Available)”, <https://data.oecd.org/fdi/inward-fdi-flows-by-industry.htm#indicator-chart>.

⑥ Cornel Ban & Dorothee Bohle, “De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Policy Continuity in East – Central Europe”,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 pp. 1 – 23.

大,经济衰退更为明显,这给匈牙利偏离“欧洲化”道路提供了土壤。^①在匈牙利,金融机构和货币领域的政策变化是由反对市场的政治力量主导的。金融民族主义旨在增强国家对金融事务的控制,对外资银行采取去金融化和金融抑制政策。匈牙利并非该地区唯一经历民族主义复兴的国家。2015年的波兰议会选举也迎来了一个紧跟匈牙利范例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府。而在捷克,选民支持抵制紧缩计划的政府,将选票投给了一位一直鼓吹民族主义、有排外情绪的总统。

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联盟政府变革的核心是激进民族主义,即重新建立经济主权并维护国内经济利益。2011年秋,政府对“债务奴役”宣战。政府公开的民族主义及反金融资本的立场,旨在使弱势部门同外资银行相对抗,从而在社会各阶层中为其干预政策寻求支持。在反对“债务奴役”的过程中,匈牙利切断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系,并寻求减轻持有外币贷款的家庭的负担。按照优惠汇率转换外汇贷款,构建汇率保护机制,以及最终将几乎所有外汇贷款强制转换为匈牙利福林计价。^②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政府承诺将特定经济部门“匈牙利化/本国化”,打造本土企业家,减少服务于本国市场的外资企业的盈利机会。为了消除国内外资本的不平等地位,政府设计了两套政策:部门税和一些公司的国有化。2009—2014年,特别部门税收收入占中央预算和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的比例从1%上升到近6%。最大的一部分税收来自金融部门。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受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③

匈牙利并没有阻碍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仍然很强。2011年,政府通过成立匈牙利投资促进局对外部投资进行重整。外资企业占增加值的份额在匈牙利超过50%,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超过40%,在波兰约为30%。此外,2010年以来,这四个国家的外资在增加值、生产、投资和就业方面的份额均有所增加。^④匈牙利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并没有全面敌视外国直接投资,而是谨慎地、有选择性地加以对待。到目前为止,尽管匈牙利政府的民族主义言论十分激进,但它并未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其依附型出口拉动增长模式。根据2015年签订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联盟—奥地

利第一储蓄银行三方协定,匈牙利政府同意在2019年底将银行税减至欧盟平均水平,这体现了国际金融规制对金融民族主义的限制。^⑤

(二) 依附型贷款增长、自愿紧缩与内部贬值

转口贸易作为拉脱维亚主要的经济形式,为其近邻俄罗斯提供了离岸金融服务和商业活动,金融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拉脱维亚的金融部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外资银行,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银行为代表,主导了拉脱维亚本国的信贷市场;二是本国银行,主要依赖非本国居民存款,并向非本国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后者使拉脱维亚在全球非法财富链中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它充当了后苏联时期非法资金的流入口。拉脱维亚的银行体系主要经由两个渠道受到外部冲击:一是依赖外币的私人债务;另一个是国内机构提供的离岸金融服务。2008年,政府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在拉脱维亚市场经营银行的北欧国家政府汇集了75亿欧元,占拉脱维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3。拉脱维亚在执行已达成一致的稳定计划方面取得进展之后,援助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其中包括对财政整顿和各种结构改革的投入。^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迅速蔓延,时任拉脱维亚总理的伊瓦尔斯·戈德马尼斯

① 高歌《匈牙利和波兰“欧洲化”道路的偏离》,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0期。

② Dorothee Bohle, “Mortgaging Europe’s Periphery”,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53, No. 2, 2018, pp. 196–217.

③ Dorothee Bohle and Béla Greskovits, “Politicising Embedded Neoliberal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Hungary’s Development Model”,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42, No. 5, 2019, pp. 1069–1093.

④ Béla Galgóczi and Jan Drahokoupil (eds.), *Condemned to Be Left Behind? Ca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merge from Its Low Wage Model?* Brussels: ETUI, 2017, pp. 25–47.

⑤ Cornel Ban and Dorothee Bohle, “De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Policy Continu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 pp. 1–23.

⑥ Leonardo Pataccini and Raul Eamets, “Austerity versus Pragmatism: A Comparison of Latvian and Polish Economic Policie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 Ten Years Later”, in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Vol. 50, No. 4, 2019, pp. 467–494.

(Ivars Godmanis) 在 2009 年 2 月被迫辞职,由财政部前部长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领导的新政府在 3 月份成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包括实施一项以经济紧缩和财政整顿为重点的经济计划。根据该计划,总财政目标的 2/3 将通过削减支出来实现,其余 1/3 则通过增税来实现。正如东布罗夫斯基斯所说,紧缩和财政整顿战略旨在实现金融稳定,而这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① 拉脱维亚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决定是避免拉脱维亚拉特贬值,为加入欧元区做好准备。这是一项极具争议的决策:一些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团队都建议拉脱维亚取消货币挂钩以重新取得竞争力。然而,拉脱维亚政府并不理会这一建议,而是采取欧洲最严厉的紧缩方案之一,以保护其货币挂钩政策。拉脱维亚政府严苛的政策调整成为其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对负债累累的房屋所有者帮助甚微。历届拉脱维亚政府都试图通过转移银行资不抵债型房贷的部分风险来改变这一状况,但由于北欧的银行施加了巨大的阻力,这些尝试都失败了。^② 拉脱维亚总体上的改进较少,商业利益相比之下更占上风。^③ 拉脱维亚在 2014 年 1 月 1 日加入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历经十年时间才达到危机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④

(三) 去金融化的影响

依附型出口增长模式和依附型贷款增长模式都有对外国资本的依附性。匈牙利的政治力量沿着民族主义道路走得最远,波罗的海国家对欧盟的依附性的争议较小,加入欧盟为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大规模投资奠定了基础。这些国家的政策调整都是通过庞大的紧缩方案进行的,涉及公共部门减薪和裁员、福利削减和有限增税。总体上,中东欧国家只是改变了一些经济机构,而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潜在的增长模式。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所有波罗的海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一直极不稳定,而结构基金流入稳步上升,并已取代外国直接投资成为最重要的外国融资来源。^⑤

就中小企业贷款占比、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政府债券收益率、金融和资本交易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等指标来看,匈牙利和拉脱维亚的去金

融化措施具有以下特征:首先,跨国银行并未按照预期为匈牙利的非金融公司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提供资金,因此,当青年民主主义联盟在 2010 掌权之时,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廉价的贷款就成为其优先事项之一。^⑥ 到 2016 年,匈牙利中小企业贷款占商业贷款的比例增长了近 27%,这一数据在拉脱维亚则有所下滑;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在两国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匈牙利的下降幅度则达到了 80% 之多(2009—2018 年)。其次,在政府债务方面,去金融化的影响则更为复杂,两国十年期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都出现了大幅下降,但这一趋势在拉脱维亚则更为明显。最后,对金融部门的税收成为实行金融抑制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高比率的银行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民族主义的危机应对路径,匈牙利的金融和资本交易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2010 年后出现了明显上升,而拉脱维亚则恰恰相反;从税率来看,匈牙利银行业的税率最高为 0.53%,为欧盟最高水平,这一数字在拉脱维亚仅为 0.036%。^⑦

尽管中东欧国家在应对金融化和依附发展方面表现出不同姿态,但事实上,吸引国际投资仍然

① Leonardo Pataccini and Raul Eamets, "Austerity versus Pragmatism: A Comparison of Latvian and Polish Economic Policie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 Ten Years Later", in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Vol. 50, No. 4, 2019, pp. 467-494.

② Dorothee Bohle, "Mortgaging Europe's Periphery",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53, No. 2, 2018, pp. 196-217.

③ Cornel Ban and Dorothee Bohle, "De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Policy Continu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 pp. 1-23.

④ Leonardo Pataccini and Raul Eamets, "Austerity versus Pragmatism: A Comparison of Latvian and Polish Economic Policie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 Ten Years Later", in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Vol. 50, No. 4, 2019, pp. 467-494.

⑤ Dorothee Bohle, "European Integration,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Crises Trajectories on Europe's Eastern Periphery",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2, 2018, pp. 239-253.

⑥ Cornel Ban and Dorothee Bohle, "De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Policy Continu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 p. 3, pp. 11-12.

⑦ Michael Devereux, Niels Johannesen and John Vella, "Can Taxes Tame the Banks?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Bank Levies", i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9, No. 624, 2019, p. 3062.

是其发展的重要支柱。针对中东欧国家出现的各种问题,近年来欧盟通过了多项政策法案及制裁,以敦促该地区国家改善营商和投资环境。2018年初,拉脱维亚大型银行 ABLV Bank 因被指控非法洗钱而受到了美国和欧盟的严厉制裁。在欧盟压力之下,拉脱维亚官方迅速表态并采取了行动。2018年4月,拉脱维亚成立了金融部门合作平台,以期重建国际信誉。^① 2019年3月,拉脱维亚财政部长詹尼斯·雷尔斯(Jānis Reirs)表示,稳定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催化剂,拉脱维亚正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完善管制机构的职能、权力和责任,建立一个监管良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② 拉脱维亚总理克里斯亚尼斯·卡林斯(Krišjānis Kariņš)在2019年5月的内阁部长及外国投资者理事会高级会议上表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保证私人投资(包括外国投资)更多地流入拉脱维亚,改善营商和投资环境,政府正在努力改善这种环境,特别注重金融、教育、卫生、法治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治理。^③

事实上,积极推行去金融化的匈牙利并没有阻止国际投资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欧尔班在2019年1月会见国际投资银行主席时表示,将银行总部设立在匈牙利将加强布达佩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④ 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关于如何改善经济状况这一问题上,欧尔班给出的答案是“投资,投资,还是投资”^⑤。看起来有所成就的“欧尔班经济学”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国际资本的作用,来自西欧的投资仍然是其经济增长的动力。^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匈牙利十分重视来自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2020年7月份的欧盟峰会结束时,欧尔班表示,任何试图将法治作为要求的欧盟预算尝试都会被拒绝。但他随后承认,这个问题远未得到解决。^⑦ 而许多匈牙利高层官员公开表示希望得到更多的欧盟资金来应对其经济发展的困境。

四、去金融化改革的前景

长期来看,去金融化可能会减少中东欧国家生产性行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金融民族主义既难以同国际金融资本相对抗,也无法摆脱对其的依附地位。实际上,信贷和债务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氧气的机制,特别是通过创造虚拟货

币来保证资本和服务的流动。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来看,债务来源于核心国对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直接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成功的进口替代政策,边缘国家将一直落后于核心国家,并且总是向核心国家借债,以抵消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和技能方面的劣势。^⑧

(一) 去金融化难以摆脱依附地位

在金融化和入盟的过程中,中东欧国家与原欧盟国家的发展水平继续拉大。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社会转型,中东欧国家仍然落后于欧洲平均水平,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大多数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低、创新经济部门的数量有限、经济结构改革尚未完成、农业发展落后等。即使是捷克、斯洛文尼亚这些中东欧最发达的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比欧洲平均水平低20%—

① Ministru Kabinets, “Cooperation Group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Discusses the Government’s Strategy for Adjustment of the Sector”, <https://www.mk.gov.lv/en/aktualitates/cooperation-group-financial-sector-discusses-governments-strategy-adjustment-sector>.

② Finanšu Ministrija, “Minister Jānis Reirs: Latvia Needs an Efficiently Regulated and Secure Financial System”, <https://www.mk.gov.lv/en/aktualitates/minister-janis-reirs-latvia-needs-efficiently-regulated-and-secure-financial-system>.

③ State Chancellery, “Government and FICIL Agree on the Priorities to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Labor Shortage”, <https://www.mk.gov.lv/en/aktualitates/government-and-ficil-agree-priorities-improve-business-environment-university>.

④ “Orbá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ank in Hungary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https://hungarytoday.hu/orban-international-investment-bank-in-hungary-significant-development/>.

⑤ John Chalmers and Gabriela Baczyńska, “Hungary to Shore Up Battered Economy with Investments, Tax Cuts, PM Say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ungary-orban-economy/hungary-to-shore-up-battered-economy-with-investments-tax-cuts-pm-says-idUSKCN26G25G>.

⑥ Matteo Tacconi, “‘Orbanomics’ or Why Hungary Needs Europe”, <https://www.resetdoc.org/story/orbanomics-hungary-needs-europe/>.

⑦ Pablo Gorondi, “Hungarian PM Claims EU Win but Rule-of-law Dispute Not Over”, <https://apnews.com/article/budapest-viktor-orban-international-news-poland-summits-8baa2a592926e557a78822d6fff57508>.

⑧ Vassilis K. Fouskas and Constantine Dimoulas, *Greece,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EU*,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28.

40% ,而最落后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仅为前者的40%。中东欧国家开始从“唯欧洲化”转向更加多元、务实的全方位合作。^① 尽管各国政府经常强调重新获得经济主权的必要性,但实际的路径修正没有脱离依附模式。比如,匈牙利的社会经济发展融资仍然主要依赖外资,尽管这种来源更加多样化,不仅包括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越来越多地包括欧盟的结构基金和劳工移民的汇款。迄今为止,匈牙利的路径调整似乎没有形成一个有前途的新发展战略:既没有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国内资产阶级,也没有关于长期社会投资的正确尝试。^②

依附论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指出,去金融化是由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国内危机造成的强大社会压力的产物。大资产阶级很清楚,能阻止国际资本流入的唯一力量是充分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民主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需要依靠民众运动,而民众运动有可能剥夺大资产阶级的权力、发展社会主义,所以民族主义者退缩并接受了“发展是目的,民族主义是工具”的论点。事实证明,过度依赖国际资本的发展模式使得工具化的民族主义在国际资本面前不堪一击。^③ 从长远来看,中东欧国家的这种政治宏图注定要失败。

(二) 欧盟强化新自由主义改革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结构基金取代了外国直接投资,成为这些国家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④ 欧盟结构基金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还同时服务于市场扩张。在欧盟东扩进程中,结构基金运行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资助方和受资助方的不对等关系更加明显。欧盟在中东欧国家推行欧洲制度和生产标准的一个现实结果,就是确立了“老欧洲”的资本和企业在中东欧地区的优势竞争地位,并为欧洲资本向新成员国的自由流动扫清了道路。^⑤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进行了广泛的干预,随后对危机的政策回应也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维也纳倡议的形式动员起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体系首先强调危机的外部根源,认为该区域在金融上融入欧洲银行,减少了与以往危机相关的资本流动的逆转,起到了缓冲作用。它推动的应对危机的措施更加注重个人和非国家机构,而不是传统的

国家干预,重点是促进区域商业集群和中小企业的发展。^⑥

从2010年起,国际金融机构的联合投资为中东欧的金融部门带来了250亿欧元的投资,并将重点转向了国内生产和金融方面,这也是中东欧应对危机的长期应急措施,其实质是确保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失败中前进。到目前为止,危机的遗产看起来是走向一个更小的国家和更不平等的社会。^⑦ 事实上,欧尔班政府上台以来,匈牙利的社会开支水平不升反降,2009—2018年,其社会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超过16%,从2017年开始这一指标就已降至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之下。拉脱维亚更是如此,在2010—2012两年间经历了21%的急剧下降后,其社会支出水平一直显著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⑧ 在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领域,国内政治精英都表现出对欧洲化的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推崇。^⑨ 即使在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的匈牙利,虽然政治精英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但在危机后的2014年,仍然有78.9%的议员认为匈

① 殷红等《入盟与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0—201页。

② Dorothee Bohle and Béla Greskovits, “Politicising Embedded Neoliberal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Hungary’s Development Model”,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42, No. 5, 2019, pp. 1069–1093.

③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④ Dorothee Bohle, “European Integration,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Crises Trajectories on Europe’s Eastern Periphery”,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2, 2018, pp. 239–253.

⑤ 张浚《结构基金及欧盟层面的市场干预——兼论欧盟的多层治理和欧洲化进程》,载于《欧洲研究》2011年第6期。

⑥ Stuart Shields, “The EBRD, Fail Forward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Periphery”, in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Vol. 31, No. 2, 2020, pp. 230–248.

⑦ Martin Myant, Jan Drahokoupil and Ivan Lesa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East –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in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65, No. 3, 2013, pp. 383–410.

⑧ OECD Data, “Social Spending”, <https://data.oecd.org/socialexp/social-spending.htm>.

⑨ Irmina Matonyte, Gintaras Šumskas and Vaidas Morkevičius, “Europeanness of Lithuanian Political Elite: Europhilia, Russophobia and Neoliberalism”, in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41, No. 1, 2016, pp. 150–172.

牙利可以从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中受益,且匈牙利议员与欧盟的联系也仍然处于较高水平。^①

五、结语

依附型金融化导致了中东欧国家的脆弱性,这些国家的去金融化政策尝试虽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难以抵御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压力。一方面,依附型金融化是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赖以维系的资源。例如,尽管官方的反跨国公司言论有所高涨,匈牙利仍然通过慷慨的投资激励来促进和吸引外国投资。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新自由主义。相反,它优先考虑“好的”制造业、商业服务以及出口导向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坏的”、投机性的或垄断性的外国直接投资。^②另一方面,推动中东欧国家银行体系金融化的进程难以逆转。原因在于,全球金融核心地区的政策制定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其企业在危机后的盈利能力,并支持流动性管理策略,而正是这一策略促成了危机的产生。^③欧洲经济治理的新自由主义规则得到进一步强化,金融被视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其核心见解之一是,市场的运作总是可以通过改革其运行框架而得到改善。问题不在于如何尽可能地使经济政策免受市

场压力的影响,而是如何改革机构和规则,提高政府和其他市场机构的反应能力,以确保经济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④

[作者单位]刘慧,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李文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文山]

-
- ① Borbála Göncz and György Lengyel, “Changing Attitudes of Hungarian Political Elites Towards the EU (2007 – 2014)”, in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41, No. 4, 2016, pp. 106 – 128.
 - ② Dorothee Bohle and Béla Greskovits, “Politicising Embedded Neoliberal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Hungary’s Development Model”,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42, No. 5, 2019, pp. 1069 – 1093.
 - ③ Stephen C. Nelson, “Banks beyond Borders: Internationalization,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Behavior of Foreign – owned Bank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49, No. 2, 2020, pp. 307 – 333.
 - ④ Markus Ojala, “Doing away with the Sovereign: Neoliberalism and the Promotion of Market Discipline in European Economic Governance”,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6, No. 1, 2021, pp. 203 – 215.